

阿宁作品《灾星》中的批判精神

马晶晶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阿宁在《灾星》中对当下国人精神弱点的解剖与批判,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于弱势群体的深沉关注又显示出了阿宁对于物质社会中人们精神世界所暴露的暗疾和危机的深刻思考。这种现实观照和对人性的深度挖掘也体现出了阿宁《灾星》中的批判精神具有鲁迅的风格。

关键词:阿宁;《灾星》;鲁迅;批判精神;保定作家群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4-0067-04

阿宁,作为保定作家群的第三代作家,一直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关注着现实,关注着人的生存状态,尤其关注以小人物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他的《校园里有一对情人》、《米粒儿的城市》等。阿宁为读者如实描写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并对其人性进行深度开掘,展现人物在环境中人性的丑恶、挣扎、痛苦、无奈等。阅读阿宁的作品,总会觉得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力量,带动读者随着他的文字欢乐、悲伤、愤怒……在笔者看来,这种力量就在于阿宁在创作时一直有独立可贵的批评精神,笔者将对《灾星》中的批判精神做一具体解读。

《灾星》选自阿宁的中篇小说集《米粒儿的城市》,主人公福亮是个典型的弱者,他是一个农民,跟着包工头到城里打工,他没有经济地位、没有社会地位,更让读者痛心的是他在心理上也处于弱势。阿宁以批判的精神姿态,以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为大背景,为读者展现了福亮痛苦、短暂的悲剧人生。之所以解读《灾星》的批判精神,是因为在笔者看来,阿宁在这部作品中的批判精神颇有“鲁迅的风格”,尤其是和鲁迅的表现农民生存状态的小说相比较。鲁迅先生有很多作品都是以农民为表现对象,《故乡》里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等。有研究者曾这样说:“毫无疑问,鲁迅最热烈、最深沉、最诚挚的感情,始终是倾注在农民群众身上的。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人感到他对农民群众,具有像鲁迅那样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的感情……他用渗出血泪的目光焦灼地注视着它。”^[155]阿宁在《灾星》中,同样是把心中最深沉的情感赋予了福亮这个人物,像鲁迅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然这种题材的趋同,还不能充分说明阿宁有鲁迅的风格,关键在于对福亮代表的这一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的认知,尤其是对其生存状态悲苦味道与悲剧结局的书写,对其人性的弱点的解剖,阿宁表现出了和鲁迅相似的批判精神。

一、对福亮的愚昧及其所导致的悲剧的批判

鲁迅的作品中愚昧的人物形象处处可见,上演了一幕幕悲剧。《祝福》中愚昧的祥林嫂听信柳妈的话,用捐门槛拯救自我,四嫂的一声喝斥惊断了祥林嫂的愚梦,最终毁灭。《药》中愚昧的华老栓,将儿子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人血馒头上,最终花费多年积蓄买来蘸满革命者鲜血的馒头,却无法挽救儿子的性命,也无法解除他自己精

神世界里的痛苦。《明天》里的单四嫂子愚昧地用仙药来挽救儿子的性命，最终失去了自己唯一的精神寄托与支柱。还有用“精神胜利法”自我麻醉的愚昧的阿Q、被科举制度戕害了满口之乎者也的愚昧的孔乙己……

阿宁的《灾星》在对福亮悲剧一生的书写中也对其愚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其一，主人公福亮跟随包工头进城打工，先后跟着二伯、来顺等多个人，但次次被骗，自己辛苦的血汗钱被他人骗走，他们没有用正当的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反而对此做出愚昧的解释，福亮的岳父说：“认了吧，这是命。不到来财的时候，财到眼前也留不下。”^[2160]而福亮“他流了泪，为自己没有财运而难过”^[2160]。其二，“非典”来了，福亮发烧了，首先他不相信自己得了“非典”，原因不是出于科学，而是在于福亮愚昧的想法：“他不可能是那种病，那种病是有钱人得的，他没做过缺德事儿，凭什么找到他身上。”^[2164]其三，所有和福亮接触的人都发烧了，这让福亮不得不相信自己真得了“非典”，他没有马上到医院进行科学的医治，却用自欺欺人的愚昧方法来欺骗自己：“福亮想，他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他这一生吃了太多的苦，老天爷不会这么不开眼，不会让他死。别人得‘非典’活不了，他能活。”^[2168]所以，福亮就硬扛着，他也害怕去医院，因为他听民工们说：“这种病发现了就要关起来，到医院只是关在屋里等死。死了没人给穿寿衣，一个挺长的铁钩子钩住下巴，送到火炉子里烧了……”^[2173]福亮害怕被铁钩子钩下巴，愚昧的福亮更害怕到医院会花钱，他东躲西藏，但“福亮不知道他如果出来，就会被安排到特护病房里，所有的治疗费用都由国家负担，医院对他是免费救治的”^[2107]。小说的结局出乎读者的预料，福亮不是“非典”，仅仅是感冒引起的普通肺炎，但福亮却因为自己的愚昧延误了治疗时机，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纵观阿宁对福亮悲剧一生的描写，笔者认为其对人物愚昧的揭露入木三分。五四时期的鲁迅曾这样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年前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这样的创作理念决定了鲁迅先生对于愚昧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否定与批判，因为其作品中的人物虽然愚昧，但就人性来说，无论是闰土、祥林嫂还是单四嫂子，都是善良、朴实、厚道的人，所以，鲁迅先生更多是在痛心疾首处用自己的笔来唤醒他们。那么阿宁呢？他一直关注的就是现实人生，他曾经说过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写出人性，阿宁虽然没有像鲁迅那样直接说出要引起疗救的希望，但当读者在《灾星》里看到他蘸满苦汁的文字时，就能感受到阿宁用悲悯的情怀来渴望着他作品中的人物能够得到救赎，因为福亮同样也是善良、厚道的人，阿宁就像鲁迅一样，不愿意看到善良被毁灭。

二、对他人痛苦无视与漠然的批判

鲁迅先生对国民的这一精神劣根性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当然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理论上来说，在《华盖集》的《这个和那个》中有：“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而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4]；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5]从创作实践来说，鲁迅写了众多的看客形象。《药》里聚在华家茶馆的一千人等，既是将夏瑜的牺牲当做谈资的看客，也是华家痛苦悲伤的看客。《祝福》里的祥林嫂，周围的人对她的痛苦都是漠然的，没有同情，他们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不是出于同情，而是猎奇心理，一旦听腻了就会厌恶嘲笑祥林嫂。《孔乙己》中酒店里的酒客一次次嘲笑孔乙己，揭开他的屈辱与难堪……

鲁迅呼唤对全体国民进行文化与精神的启蒙，来疗救这样的精神疾病。时间过了近百年，当读者读完《灾星》，心底也许还会有一丝的悲凉，因为依然有一些人在他人悲惨的人生路上充当看客，对他人的痛苦不闻不问，更可恨者就是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福亮从小没了爹娘，跟着后爹后娘，沉默寡言，隐忍屈从，面对如此命苦又老实巴交的福亮，作品中的包工头从二伯到来顺，不仅不同情，还无情地且理直气壮地吞没或克扣福亮的血汗钱。当福亮发烧以为自己得了“非典”时，他周围的人大多都是看客，“工棚里的工友走了大半……有人感觉到他在发烧，悄悄搬到了别的屋子。后来其他的人也搬走了。他们走的时候没跟他说话，好像怕惊动了他似的”^[2164]。曾经的福亮的“敌人”孙元，面对虚弱的不断咳嗽的福亮，吝啬地连一杯茶都没沏，只是得意地炫耀自己的财富。克扣过福亮工资的来顺，面对虚弱地昏过去的福亮，虽然给福亮找了落脚的地方，但却说：“咱们在一块儿呆一场，我不害你，你也不要害我。我给你把吃的喝的都预备好……要是有人发现了你，你不要说认识我，就说你自己走到这儿的。”^[2105]足以见出这些人对于福亮的痛苦与不幸都是漠然无视的。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曾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3]因此，尽管《灾星》可能会带给读者一丝悲凉，但笔者却又在阿宁不动声色的叙述中燃起了希望。首先，因为当代作家阿宁，已然接过鲁迅先生手中的接力棒，不回避现实中国国民精神的疾病，大胆地予以揭露与批判，这无疑是为当代人的空虚之心敲起的警钟；其次，因为阿宁在《灾星》中也写了很多在福亮的人生路上给予他温暖与照料的人，比如在他失去母亲时无私地给过他吃喝的乡亲，在福亮发烧怀疑是非典时，善良的女人“月饼”一直陪伴在福亮身边。

三、对恃强凌弱者、摧残弱者行径的批判

鲁迅先生在他的《杂忆》中曾说：“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14]关于精神的这一疾病，鲁迅先生称之为卑怯的奴性。不过多地举例子，仅以阿Q为例足以见全体，阿Q遭到假洋鬼子的棒喝丝毫不敢反抗，但转而就对比自己弱小的小尼姑，极尽侮辱之能事。

阿宁在《灾星》中对这一精神痼疾再次进行了书写与批判。福亮跟着包工头二伯，为了把工钱拿到手，拼命地干活，而他的工友们面对克扣工资的二伯敢怒不敢言，却转而在福亮睡觉时拿土坷垃砸他，他吃饭时往他碗里扬沙子；福亮的后爹杨守满，“是个最没出息的人……他不仅怕孙元，连跟孙元走得近的都怕。孙元给他个好脸色，他就一副感激不尽的样子”^[15]。在村长孙元面前唯唯诺诺的杨守满，回到家里对待自己善良弱小的妻子，却是粗暴的，非打即骂；村里分地时，孙元看上谁家的女人，谁家就能分上好地，农民们对于这样的事情没有团结起来反抗，反而盯着孙元对哪个女人感兴趣了，“孙元对哪个女人感兴趣了，这个女人就比任何时候都招人痛恨”^[15]。

鲁迅先生对于这种恃强凌弱者，是极其痛恨与憎恶的，他在《我之节烈观》中曾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16]所以，鲁迅先生描写批判这类人的嘴脸时丝毫不留情面。同样，阿宁在《灾星》中尽情揭露了恃强凌弱者的恶劣人性，从其言语到行为进行了完整的刻画，读者在阿宁的刻画中感受到的是恃强凌弱者的可恶可恨，感受到的是作者对这类人的否定与批判。

四、结语

对国民精神弱点与疾病的描写，最终要落到其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上，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就农民而言，在其思想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就是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所以，当鲁迅先生对其进行解剖与批判时，其最终的旨归就是批判封建礼教及封建礼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封建礼教的长期贯彻，人的感情受到长期的压抑，使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损伤……造成了人的思想灵魂的畸形发展”^[17]。所以，鲁迅先生从《狂人日记》就指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此后便塑造了一系列被封建礼教吞噬或扭曲的生命，闰土“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18]；祥林嫂在死前已经“消尽了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19]。这些人要么被封建礼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彻底“吃掉”，要么就是被其消磨了人性，变成了“非人”的状态。有研究者指出，“把人不看作人，而是看作可供使用的工具，这是封建传统思想的内在本质”^[20]。而鲁迅先生正是通过塑造众多的“非人”形象，来批判封建礼教占统治地位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大环境，所以，鲁迅被称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21]。

阿宁《灾星》中人物生活的背景是2003年左右的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物质生产取得了极大发展，思想解放也取得了极大进步，人们基本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但是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出现了一些暗疮，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金钱为代表的利益成了某些人心中最牵肠挂肚的东西，成了某些人眼中最大的追求。关注自己的利益，漠视他人的利益。或是出于生活的压力，或是基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很多像福亮一样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他们的思想观念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他们渴望传统的家庭幸福，但当他们看到城市里一个马桶都要3000元时，当他们看到村子里有人盖二层小楼时，他们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只能扼杀自己心中想回家的梦想，拼命在城里赚钱，成了赚钱的机器，“福亮不想躲。躲了还能挣上钱吗？钱跟灾比，他跟钱亲，躲灾就成躲钱了。这一年的钱不挣到手他决不走”^[22]。在“非典”和钱之间，福亮选择的是钱而不

是自己的生命。苦苦挣扎在城市里的他,被某些金钱至上、失去人性的人们欺骗了,“工地里所有活儿完工后,民工们围在工头门口……他们像大雪后的一群牛羊,静静地等在牛圈羊圈门口,这些老实的牲畜们沉默着,等着围门打开,等待命运给他们寻找食物的机会”^{[2]58}。阿宁在《灾星》中通过对福亮悲惨一生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了金钱至上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

读鲁迅的作品可以让人“直面惨淡的人生”,在警醒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是因为鲁迅作品中有可贵的批判精神。在笔者对《灾星》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阿宁的作品里有鲁迅式的批判精神。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中国人遭遇的是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危机。而今天的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历经“五四”与80年代两次文化启蒙的中国人,精神世界虽然还有某些暗疾或者危机,但相对于鲁迅先生生活的时代,已经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与进步,所以,在笔者看来,阿宁《灾星》中的鲁迅式批判精神,其更大意义在于通过批判某些人人性中的弱点而让人性趋于更加完美。

参考文献:

- [1]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2]阿宁.米粒儿的城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 [3]刘玉兴.鲁迅悲剧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探析[J].龙岩学院学报,2006(A01):43-45.
- [4]张绍芬.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形象[J].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14-16.
- [5]鲁迅.鲁迅散文杂文[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1.
- [6]鲁迅.鲁迅小说[M].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1.

The Spirit of Criticism in A Ning's Works *Bane*

Ma Jingj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ne*, A Ning criticize the spiri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natomical weaknesses, which made his works with a strong critical spirit. His deep concern for vulnerable groups has shown A Ning's profound thinking for materialistic society in which people are exposed to the spiritual world the unmentionable disease and crises. This reality of human nature contemplation reflects the depth of excavation A Ning *bane* in the critical spirit with Lu Xun's style.

Key words: A Ning; *Bane*; Lu Xun; critical spirit; a group of Baoding writers

(责任编辑 王作)